

烽火

曙光

源流

通道

前哨

熔炉

关钥

和合

观察

一座辽西小城,为何撑得起一个独立的展览单元 喀左青铜重器不只是窖藏

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

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坐落在大凌河北岸的一处山冈上。站在遗址前,喀左博物馆副馆长侯申光时常陷入沉思——若论形胜之地,这里应该算得上的一处:大凌河自西南向东北奔流,在山前分成两支,山冈南面正对的是开阔的大凌河谷地,居高临下,可俯视四野;若有大活动,又便于四方知照。向西南眺望,大凌河东岸山峦间,一座小山孤然而立,名为孤山。1973年,孤山西侧的台地上,发现了两个青铜时代窖藏——北洞1号和北洞2号遗址,共出土12件大型青铜器。

不止于此。大凌河两岸,20世纪以来陆续发现多处青铜窖藏,让人们的视线跨越3000年时光,重新凝聚在这片土地。青铜时代的中华大地,农耕文化与北方畜牧文化均已获得长足发展。穿越燕山山脉的河流,成为两种文化互动交流的重要通道。而大凌河,正是沟通燕山南北的关键廊道,沿岸发现的青铜窖藏,宛如一座座路标,成为那段历史的鲜活见证。

小城惊世

“看见啦,里面有个‘鱼’!”

辽宁省博物馆“古代辽宁”展上,一群观众围着一件青铜鱼尊,弯腰、侧头,反复调整着视线角度。透过底座上那个十字镂空的小孔,有人终于捕捉到了秘密:一条刻在内壁上的“鱼”字。人群中,惊叹声此起彼伏。

这件自带“捉迷藏”属性的青铜器,出土于辽西喀左。3000年前的工匠,把铭文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副研究员温科学说:“馆里常设展览‘古代辽宁’中,‘风华北渐 商鼎周彝’单元特别受欢迎。你仔细数数,30多件商周青铜礼器,绝大多数都来自辽西,来自喀左。”

一座辽西小城,为何撑得起一个独立展览单元?答案,埋在大凌河两岸的泥土里。

辽西地区,尤其是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境内大凌河沿岸的丘陵地带,20世纪屡有商至西周早期大型青铜礼器出土。1941年,喀左小城子洞上村咕噜沟,一件大铜鼎破土而出。重75公斤,半米多高,满身铭文。当时的报纸称其“满盘铭文”。那是辽宁已知出土最早、体量最大的商周青铜器之一。然而,这件国宝被日伪搜得,先运至当地展出,后送奉天(沈阳)。此后,下落成谜。

1955年5月,平房子镇海岛营子村马厂沟小转子山,发现16件青铜器。鼎、甗、簋、盂、卣、壶、尊、盘……其中6件带着铭文,包括侯侯盂、鱼父癸簋、蔡簋、史戊卣、义作父庚卣及鱼尊。专家们发现,周围只有生活遗址,没有墓葬。这是一处窖藏。

1973年,大凌河东岸,平房子镇北洞村南的孤山西北角台地上,发现两座相邻的窖藏坑。第一座坑埋藏着6件青铜器,其中一件鬲的颈部内壁,刻着6个字——“父丁孤竹亚微”。第二座坑也出土6件,方鼎、簋、甗、带嘴钵形器……种类各异,各有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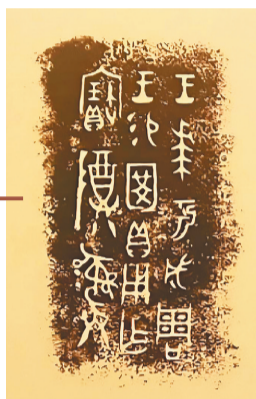
1974年冬天,又是喀左,山湾子村再发现一处窖藏,22件青铜器,15件带着铭文。其中一件“伯矩”鬲,它的主人“伯矩”,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伯矩鬲,竟来自同一家族甚至同一个人。伯矩曾接受燕侯赏赐,是喀左地区窖藏青铜器与燕侯有关的又一实证。

1979年,坤都营子乡小波汰沟黄土台地上,一件高达86厘米的大鼎现身。形制古朴,浑身无地纹托足,是典型的高代早期风格。这个字,百度都查不出读音——上面两个“耳”,下面一个“又”,有阿姨说应该读“夏”……他叫刘十安,来自沈阳市浑南区创新一校,他讲解的这件方鼎,出土于喀左北洞2号窖藏。通高52厘米,重31公斤,腹内长壁铸有24字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把它编号为2702。有学者将其解读为“夏”,是商周之际的一个方国名。铭文记载了“戈耳”赏给器主“贝”二百朋——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鼎的内底,还铸有“亚侯”徽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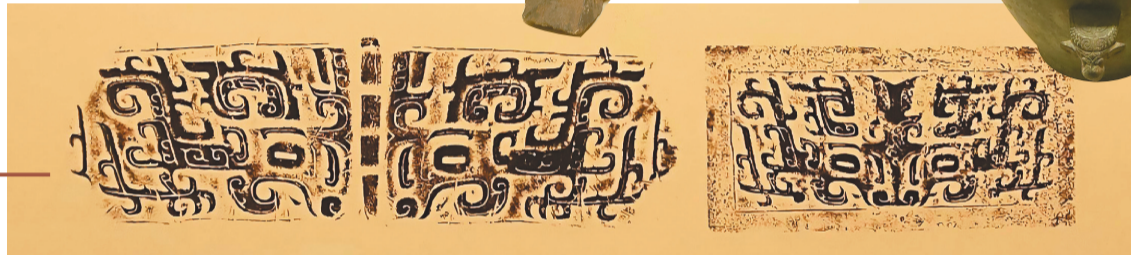
被誉为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卷体夔纹蟠龙盖甗,同样出自北洞2号窖藏。这件青



围簋



青铜鸭形尊



兽首环耳甗



饕餮纹甗



青铜簋



兽首环耳甗

青铜器窖藏 朝阳喀左

发现时间	发现地点	出土青铜器数量	青铜器名称	年代特征
1941年	喀左小城子洞上村咕噜沟	1件	大鼎(下落不明)	商代
1955年	喀左平房子镇海岛营子村马厂沟小转子山	16件	鼎、甗、簋、盂、卣、壶、尊和鸭形尊等	商至西周早期
1973年	喀左县城南30公里大凌河东岸平房子镇北洞村南孤山西北角台地(第一坑)	6件	5件小口广肩甗、1件甗	商代
1973年	喀左县城南30公里大凌河东岸平房子镇北洞村南孤山西北角台地(第二坑)	6件	方鼎、簋、甗、带嘴钵形器、2件圆鼎	商至西周早期
1974年	喀左平房子镇山湾子村北低台地	22件	鼎、鬲、甗、簋、盂、尊、卣等	商至西周早期
1979年	喀左马厂沟以北约50公里处坤都营子乡小波汰沟黄土台地	11件	大鼎、铃首匙、方座簋、饰粟点纹覆钵式器盖等	商代早期至西周早期

制表 董昌秋

鬲由鬲身和上盖两部分组成,古代工匠在盖上精心铸造了一条“蟠龙”。龙似随时跃起,正对龙胸腹处,刻着几只蝉,因此被形象地称为“一条吃蝉的龙”。目前,造型相似的蟠龙盖甗在我国仅发现4件,均为西周早期铸造,分别出土于辽宁喀左、四川彭州竹瓦街窖藏及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器形纹饰高度相似,推测均为周人所造,实证商周青铜文化已覆盖中华大地,南北文化交流频繁。正在展出的“围”簋,同样让人挪不开眼。它的耳部,除了上端常见的牺首,还在

商周大型青铜礼器在辽西出土后,考古学家们最先做的,是器物学层面的“认亲”。考古学家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中率先点明:喀左铜器群与西周姬燕之间,有斩不断的联系。他认为,包括喀左在内的凌源、朝阳一带,在西周初期,是燕人的重镇之一。这一判断,让喀左窖藏中“孤竹”“匱侯”等铭文,瞬间成了研究焦点。

随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把这批神秘铜器与当地同时期考古文化牵上了线。1979年,考古人员在喀左兴隆庄镇清理发掘了和尚沟墓地,出土的铜壶、铜卣形制、纹饰及铭文均为商末周初中原地区常见,与大凌河流域窖藏青铜器中的容器多有共性。这一发现将孤山窖藏与青铜时代魏晋子文化联系起来,将研究推向深入。

思考,并未止步。行为考古学的引入,又打开了一扇新窗。按照此学说的观点,任何考古遗存,都是多环节、多步骤“过程”的产物。从物质的生产、流通、使用,到埋藏,再到被发现和阐释——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类活动与自然力的参与。就喀左铜器群而言,影响“窖藏”面貌的行为,至少包括生产、流通、使用和埋藏四个环节。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抓住其中一环。

那么,喀左青铜窖藏为何集中在大凌河一带?省博物馆馆长王绵厚,从20世纪80年代初编写《东北古代交通》时,便开始关注并实地考察辽西的“大凌河古道”。除了铜器窖藏点,他还逐一调查了建昌东大杖子、喀左黄道营子、凌源安杖子等遗址和古城址。他发现,这些窖藏与相邻的遗址、城址,全都坐落在大凌河上游的古道上。

这显然是一条至少从青铜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战国、秦汉时期的交通干道。王绵厚分析认为,战国后期燕王喜败走辽西,无论他取道古“卢龙塞”北行,还是经凌源南的渗津河谷古道东北行,最终都要穿过喀左青铜器窖藏分布区。窖藏的分布,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为“燕王喜败走辽西埋藏”的说法,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支撑。

交融见证

“我们注意到一个怪事。”喀左博物馆副馆长侯申光说,“青铜窖藏附近都发现了青铜时期的文化遗址,可偏偏这些遗址里,没出过一件大型青铜器。”遗址与重器近在咫尺,却仿佛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从大凌河到辽西河流域,青铜窖藏星星点点。这背

后,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

郭大顺把目光投向了北洞。那两座窖藏坑,在孤山脚下,一左一右,主次分明——不像是仓促的埋藏,更像是精心安排的祭祀。远在赤峰,牌楼商代铜器窖藏坑也正对着大山,格局与北洞如出一辙。然而,祭祀的具体内容,至今找不到可比的考古材料。

谜底,或许藏得更深。

20世纪80年代,牛河梁遗址群发现后,考古学泰斗苏秉琦注意到,牛河梁遗址与窖藏铜器坑相距仅几十公里,窖藏坑又恰在遗址南部密集分布。他提出:“这里的坛、庙、冢和窖藏坑,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四组有机联系着的建筑群体和活动遗迹?远在距今3000年至5000年间,生活在大凌河上游广大地域的人们,是否曾经利用它们举行重大的仪式,即类似古人传说的郊、燎、禘等祭祀活动?”

如果真是这样,那些青铜重器便不只是窖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赵庆森,则做了一次细致的“族名排查”。他系统梳理了喀左青铜窖藏出土的近30件带铭文的青铜器,从中筛选出19种金文族名。结果耐人寻味:其中6种,是燕辽两地共有的;另外13种,则有外来路——既有辽西土生土长的族名,也有从中原其他地区远道而来的名字。

他把这张“族名地图”,放回了商末周初的大历史中。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兴起于西土的周人,历经克商、东征和推行封建等一系列举措,势力持续东扩。周人涌入新占领地区,这是一条自西向东的“纵向”洪流。而原本居住在东方的商系族群和东夷集团,在周人的持续挤压下,被迫迁徙:一路北上,播散到燕辽大地;一路南下,徙居江淮流域。这是一条南北分流的“纵向”轨迹。横与纵,在这片土地上激烈交汇。

赵庆森认为,这种族群迁徙的“横”“纵”格局,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东西”观念,更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融合,加速了族群与地缘格局的重组。黄河下游与燕辽、江淮,被一条条看不见的纽带紧紧连在一起,政治联动日益密切,文化交流频繁往来——不同地理空间由此共同构成了西周国家的重要单元,也为中原王朝重建“天下”秩序、走向更大的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辽西周青铜窖藏的发现,像一束光,照亮了东北青铜文明研究的空白。它推动学术界重新审视东北古代文明的分量。一件件确凿的考古实物,实证了辽宁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中的关键地位,也记录了东北大地与中原血脉相连、文化共生的悠久历史。



省博物馆展出的喀左北洞窖藏考古发掘现场场景模型。

重器夺目

在省博物馆“青铜时代”展区,一个身披“沈阳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绶带的小男孩面对渐渐聚拢的观众,认真地讲起来:“这是方鼎。这个字,百度都查不出读音——上面两个‘耳’,下面一个‘又’,有阿姨说应该读‘夏’……”他叫刘十安,来自沈阳市浑南区创新一校,他讲解的这件方鼎,出土于喀左北洞2号窖藏。通高52厘米,重31公斤,腹内长壁铸有24字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把它编号为2702。有学者将其解读为“夏”,是商周之际的一个方国名。铭文记载了“戈耳”赏给器主“贝”二百朋——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笔惊人的财富。鼎的内底,还铸有“亚侯”徽号。

被誉为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卷体夔纹蟠龙盖甗,同样出自北洞2号窖藏。这件青

耳身铸出虎噬猪的形象,虎与猪以圆雕与平雕相结合的手法铸成,形象写实,姿态生动。窄小的耳部使用三种动物题材,上下依附,艺术设计独具匠心,堪称中原商周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融合的典范。

簋的内底,铸有14字铭文,意思是:围曾参加周王在成周举行的典礼,并受到了赏赐。而这铭文,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的围器完全相同——应来自同一族或同一人。

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喀左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唯一一件既与燕侯有关又与周王室直接相关的器物。它也是辽西出土的青铜器中,唯一一件记载了周王与王都的珍宝。

寻踪古道

“关于辽西出土青铜器的研究,也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不断更新中,越走越深。”温科学说。

国宝AI了

你见过“吃蝉的龙”吗

本报记者 韩卓航

这件文物叫卷体夔纹蟠龙盖甗,出土在辽宁朝阳喀左。别看名字绕口,来头可不小。甗,是商周时期的大型盛酒器和礼器。同样造型的蟠龙盖甗,全国只有4件。

有意思的是,这4件甗,都是西周时期同一时代铸造的。

从纹饰风格到铸造技术,全都指向了同一个答案——中原文化。



扫码观看视频



卷体夔纹蟠龙盖甗